

区域制度复杂性对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陈亦康¹, 钟昌标²

(1. 宁波大学商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2. 宁波大学商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 以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呈现的区域聚集性特点为出发点, 结合制度理论, 探究区域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利用 2003-2013 年中国 700 家跨国企业在全世界 50 个国家共计 2385 家海外子公司的面板数据, 实证探究区域制度复杂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研究表明: 区域制度复杂性包含区域制度多样性和区域内国家数量。区域制度多样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呈倒 U 型, 区域内国家数量负向影响跨国企业国际化; 区域制度复杂性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较国有企业更为明显; 合资方式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尽快区域制度复杂性的挑战实现本土化经营; 跨国企业进一步国际化区位选择应考虑就近原则, 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选择适当的经营方式, 借助区域聚集和区域套利提升企业价值。

关键词: 区域制度复杂性; 跨国企业; 中国; 区域国际化; 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20)99-0054-12

1 引言

跨国企业国际化意味着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和投资上的国际化, 并且积极参与到国际的竞争。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密切往来, 国际化经营已成为企业具有竞争力的标志。近十几年来, 中国企业国际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2003-2018 年中国对外投资量由 2 855 百万美元上升至 129 830 百万美元。以 2016 为例, 从直接投资的数量来看,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已经达到 1 961.5 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 13 573.9 亿美元。同时, 中国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 并购比例提升迅猛, 说明中国已经从以绿地投资为主的阶段, 朝着以跨国并购、参股和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为主的阶段改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金额都在不断的增大。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行业分布来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的跨国并购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领域和能源开发利用领域。2015 年, 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 579 起, 涉及 62 个国家(地区), 实际交易金额 544.4 亿美元, 其中直接投资 372.8 亿美元, 占 68.5%; 境外融资 171.6 亿美元, 占 31.5%。并购领域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18 个行业大类。然而, 当我们把分析视角深入到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时, 不论是从投资的国家角度还是洲际角度来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都相对集中在一个小区内, 地域分布不均衡。从地域分布的投资数据来看, 中国企业已经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 and 地区已经基本覆盖了全球的大部分区域, 但其在地域分布上却并不均衡, 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主要集中在亚洲、北美、拉丁美洲和欧洲。因此, 在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呈现区域性聚集特点的同时, 从区域层面探究跨国企业国际化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从交易费用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等对企业国际化行为进行解释, 但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化战略和绩效影响解释最显著的还是制度理论(Wright M, 2005)。制度理论视角下的跨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研究, 最早始于 Delios 和 Beamish(1999), 他们利用日本企业对东亚、东南亚共 9 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数据研究发现, 国际化经验和东道国制度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影

收稿日期: 2020-05-07

作者简介: 陈亦康,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钟昌标,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长江学者,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E-mail: 947420285@qq.com

* 基金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编号: 71673182 名称: “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两大战略的协调机制与政策研究”;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编号: 71704087 名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宽度与深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3.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 编号: 18V5J023 名称: “新时代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响因素。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跟进。如 Brouthers(2002)探究制度对欧盟国家的企业国际化模式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制度差异与文化差异能够明显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进入模式;Ali(2010)基于69个国家在1981至2005年的对外投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多年来的研究,学者们用制度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企业国际化扩张战略、企业学习效应、克服外来者劣势、管理复杂的跨国经营等问题(Yamakawa, 2008; Gulerm2010; Buchananm2012; 宗芳宇,2012;曾德明,2016)。然而,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常态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国际化决策和最终选址呈现区域聚集性(Ghemawat, 2003; Rugman, 2006; Rugman & Verbeke, 2004)。例如,Rugman和Alan、Brain(2004)发现,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有40家银行,绝大部分的银行国际化都呈现着区域聚集特点。Alan和Simon(2004)从全球500强企业中的29家汽车公司的国际化选址发现其中23家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国际化选址呈现以母国所在地理区域为中心的聚集。胡曙虹(2019)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发现,华为的海外研发投入集中在欧洲。与此同时,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以往的研究几乎都停留在国家层面(Aulakh & Kotabe, 2008; Luo et al., 2010),虽然有部分学者观察到地方层面制度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Batisse, 2002; Liu & Li, 2006),但鲜有基于区域视角来研究制度企业国际化的文献。因此,本文基于区域视角探究制度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制度复杂性包含区域制度多样性和区域内国家数量,区域制度多样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呈现倒U型影响,区域内国家数量负向影响跨国企业国际化。不同企业所有制和企业经营模式对区域制度复杂性的反应不同。同时,本文从制度理论探究跨国企业呈现区域聚集的作用机制,对制度研究领域的缺失起到填补作用,在视角上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有助于中国跨国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的区位选择,提高企业的国际化成功率。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2.1 区域企业国际化理论机制

Vernon(1966)提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的动因。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早

期拥有垄断竞争优势的企业不再具有价格优势,企业不得已将生产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 and 地区,东道国的生产性资源优势成为企业国际化的动因。Hymer(1976)企业特定优势理论提出,不完善的市场促使企业为了生存而形成特定企业优势,这种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克服投资东道国而产生的额外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例如,在不完善的中间产品市场中,企业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不断将中间产品的交易内部化。交易内部化发展成为一种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的跨越国界行为就是企业的国际化行为。

从区域视角出发。企业已在区域内的一国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扩散、生产性资源成本逐渐增加、东道国制度转变等会削弱企业原有的竞争优势,导致企业不得已转移不具有优势的生产活动进而国际化。而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可能会遭遇强大的外国同行竞争对手、东道国政府对本土企业的扶持、东道国消费者对本地产品的偏好、东道国制度和 cultural 差异等等不利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其进一步国际化决策初,往往需结合已有的国际化经验和企业特定优势,期望通过已有优势来克服进一步国际化过程中的额外成本。

首先,Rugman和Verbeke(2004)认为,企业在东道国的国际化经验能够帮助降低企业在区域内其他国家国际化的成本。随着区域内各国子公司数量增多,企业形成集聚效应(Alfaro, 2016),企业之间地理接近,降低了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内部的专利技术转移成本。跨国品牌效应的营销等在区域内国家间的传递相较于区域外的国家来说也更容易。区域内各国在生产资源和风俗习惯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Flores & Aguilera, 2007),市场需求相近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国际化过程中的心理距离,降低企业本土化经营门槛。与此同时,已有的国际化经验,能够帮助企业以较低的成本从区域内其他国家中获取用于生产的可替代性资源。区域内各国差异化的产品市场也可以帮助企业平衡未来经济和环境改变带来的冲击(Kim, Hwang & Burgers, 1993)。

其次,企业在一国的生产经营失去竞争优势后,在一国的其他城市或地区重新建立一个子公司而进行生产经营,往往也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制度多样性和竞争环境基本不变,企业建立子公司缺乏灵活性(Buckley & Ghauri, 2004),

也很难有机会去再获利。相反,在同一区域内的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差异可供企业进行套利(Arregle et al., 2009)。企业在区域内各国建立子公司后,通过整合各国的产品市场(贸易流通、对外直接投资、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资本、劳动力、知识)来增加价值。在区域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完全整合情况下,国家之间存在绝对成本差异和支付意愿的变化,企业可以通过成为贸易商从不完全整合的产品市场套利(Ghemawat, 2003; Enright, 2005)。例如,资本市场的差异使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套利资金成本的国际差异;通过将劳动密集型活动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可以套利劳动力成本差异;更广泛地说,企业可以尝试利用地理上知识差异,将资产寻求(而不是资产开发)投资作为国际化目标。

综上,区域聚集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主要为地缘优势。区域内各国在地缘上的临近或接壤,为跨国企业套用已有的国际化经验,在一国所属地理区域的其他国家获取具有比较优势的可替代性资源,形成区域企业特定优势,为国际化提供了初始条件;同时,地缘接近为跨国企业在区域内的国际化过程中运用套利行为增加价值提供平台,企业在区域内的聚集效应实现了企业的规模效应。

2.2 区域制度复杂性因素

制度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并指导社会活动的运行(North, 1990),规范着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决定其行为在东道国的合法性(李雪灵, 2019)及母子公司之间资源共享(Kostova, 1999),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区域制度复杂性反映的是企业在一区域内各国经营时所遇到的制度冲击,主要体现在环境异质性和资源的集中度(Boyd, 1990)。区域制度复杂性直接影响企业在区域内经营模式的套用,给企业预期回报带来不确定性风险(Ostrom, 2006),迫使跨国企业在不同东道国做出差异化运营模式(Meyer et al., 2011)。

已有研究认为,区域制度复杂性体现在制度环境的数量和区域内各国制度多样性的差异。各东道国具有不同的制度环境,因此制度环境的数量主要体现在区域内国家数量,其决定企业管理层在该区域内各国运营时需要处理的政府信息数量和区域跨国经营协调成本(Hitt et al., 1998; Li & Tallman, 1996);区域内各国制度多样性,直接影响企业生产

利用的可获得性资源种类和数量,对企业的决策产生不确定性风险(Dess & Beard, 1984; Downey et al., 1975; Keats & Hitt, 1988)。例如,行业复杂性影响企业的战略活动,区域内各国制度差异与行业的盈利能力息息相关(Palmer & Wiseman, 1999; Porter, 1980)。

因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将区域国家数量和区域制度多样性共同构成区域制度复杂性,来研究其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2.2.1 区域制度多样性

区域制度多样性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Kostova & Zaheer, 1999; Holmes et al., 2013)。正式制度是政策、监管、和法律的具化,规范着公民、体制、企业的行为(North, 1991),非正式制度的内涵包括文化、习俗、公民的常识伦理道德(Scott, 1995, 2005),是人们共同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规范的组成部分,对企业区域内国际化造成重要影响。

区域内国际化过程中,已有国际化经验知识、组织学习能力(Johanson & Vahlne, 2009)以及探索和协商能力(Rangan, 2000)等企业特定优势能够帮助跨国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在区域内各国进行套利和聚集实现其价值增长。然而,区域制度多样性却影响着跨国企业特定优势的效果。一方面,跨国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时,虽然区域内各国正式制度相似性使得企业在经验知识的积累上相对容易,便于企业探索和套用区域内先前国际化经验,实现区域内多国经营。但与东道国正式制度差异所产生的外来者劣势仍然存在,这增加了企业在东道国的运营成本(Zaheer & Mosakowski, 1997)。正式制度多样性越强,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心理距离则越大(Johanson & Vahlne, 2009),跨国企业多国经营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随之加强(Banalieva & Dhanaraj, 2013),企业利用区域企业特定优势实现区域内的聚集形成规模经济难度也越高;相反,处于较小或适度制度多样性环境中。跨国企业通过已有国际化经验,易于解读区域内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企业监管和商贸法律等制度,并根据正式制度的差异进行适当调整其固有的运营模式,成功实现区域国际化。另一方面,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涵盖区域内各国在社会行为规范、公众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其虽没有如正式制度以条文规范形式影响企业行为,但大多以习惯、常识的方式

镶嵌到东道国本土企业内部,对市场行为具有不成文的约束力。Hutzschenreuter 等(2011)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多样性越高,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急剧增强,具有较强管理能力的企业才能得以生存。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因非正式制度多样性过高产生的管理挑战会抵消制度差异带来的灵活性(Lee & Makhiya, 2009; Rugman & Verbeke, 2004),抑制跨国企业的区域套利;杜江和宋跃刚(2014)探究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开发可替代性资源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正式制度差异越大,企业需要较多的时间成本来熟悉和适应东道国环境,进而企业国际化所需寻求的可替代性资源潜在成本就越高,在区域内各国间新建立子公司风险也越大。当区域内各国之间非正式制度多样性较小或适度时,非正式制度多样性也被视为潜在的获利资源,而不仅仅是国际化中的挑战(Ghemawat, 2003)。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区域国家间制度差异进行套利,区域内各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也能够帮助企业将特有优势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化。例如, Kogut 和 Zander (1993), Furman 等(2002)的研究结果认为,不同的国家往往具有不同的创新体系,从而各国的创新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也存在差异,适度的非正式制度多样性环境中,企业可通过已有国际化经验快速从不同的体系获得新的学习机会。

考虑到区域制度多样性对区域聚集和区域套利的作用,我们认为区域制度多样性和跨国企业国际化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低到适度的区域制度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套利行为(Timothy A, 1998);这一阶段,企业的套利效益比制度多样性的风险损失要大。适度的制度多样性对企业国际化有强大的吸引力,企业在该阶段能够克服制度多样性的挑战并通过区域内各国差异进行套利行为。然而,制度多样性过高对企业区域性聚集和套利的不利影响往往比较严峻。该阶段制度多样性对区域企业特定优势和企业的区域性聚集的不利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制度多样性带来的套利收益。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与企业国际化成倒 U 型关系;

H2: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与企业国际化成倒 U 型关系;

2.2.2 区域国家数量

作为区域制度复杂性的组成成分,制度多样性代表了国家之间的分歧,然而区域内国家的数量也不容忽视。Arregle 等(2009), Banalieva 和 Dhanaraj (2013)认为,区域的整体结构均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起着影响作用,因为区域聚集和区域套利机制可能发生在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并且,区域内单个国家政府对跨国企业的不利影响,有时不单单影响到单个国家内的外国投资,甚至通过多边贸易协定等方式影响到一个区域内所有国家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Zhou & Poppo, 2010)。

区域内国家的数量较多时,若跨国企业决定在本区域各国之间实现国际化,则企业必须管理的信息处理负载也很高。反过来,管理一个区域内多个国家的业务所涉及的费用和挑战也将会是巨大的。首先,国家数量会提高复杂性,国家数量意味着影响区域内国际化的谈判方数量,每个国家都代表着一个独立的决策主体,国家数量越多,跨国企业现在或是未来的国际化扩张需要参考和谈判的对象和适应的制度就越多。区域内国家数量越少,企业在区域内新建子公司、维持现有经营状态或者扩张新商业板块所需要面对和谈判的主体就减少,难度也相对较小(Gulati & Singh, 1998; Phene & Tallman, 2012)。其次,国家数量越多,企业需要处理的规章、文化价值观也相对就多样化,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因发展付出的协调成本和管理成本也相对增加。区域内各国作为独立的政策主体,制定了有所差异化的政策,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企业区域内国际化过程中遭遇的制度不确定性、政策风险、经济风险(Ostrom, 2010)。政策风险来源于政策的改变、领导权的更迭、规章制度的执行力等,已有文献已经证实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国家化选址(Jensen, 2008)。经济风险对跨国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波动和通货膨胀,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Frankel & Rose, 1996)。

以上这些挑战,与区域制度多样性无关。而是来源于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所处理的各国家政策不确定性,政策和经济风险。企业通过重新部署先前国际化能力和现有的企业特定优势来获利时,每个国家的社会规章、制度手段、对跨国企业收入的潜在影响都会妨碍到企业能力的再部署。区域内国家数量越多,企业区域内国际化所需要处理的交织在一起的各国关系的潜在成本和挑战就越大,企业面

临的经营不确定性也会随之增加。这些影响也就解释了区域内国家数量对企业区域内国际化的影响。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假设3。

H3:区域内国家数量负向影响跨国企业国际化。

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3.1 数据来源

基于跨国企业国际化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CSMAR数据库中2003-2013年中国上市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关联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企业证券代码、子公司所在国家为基准和UNCTAD数据库、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中相关数据进行匹配。为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如下处理:为排除跨国企业避税动机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去除了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避税天堂的跨国企业;删除了上市公司控制权不足10%的样本。最后汇总得到700家中国跨国企业、2385家海外子公司,样本量为5883个,遍布全球50个国家。

3.2 主要变量和数据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跨国企业国际化程度(Int)。已有研究认为,跨国企业国际化存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Hitt et al., 1997)。然而目前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大多通过利用企业在海外子公司数量或者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利润等来测算企业国际化程度,只是片面地关注到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某一个方面(Asmussen, 2009; Hitt et al., 1997; Sanders & Carpenter, 1998)。本文参考(Lu & Beamish, 2004)的方法,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来刻画企业国际化程度。国际化深度采用跨国企业在一国建立的子公司数量表示,国际化广度采用子公司投资规模表示,即子公司投资额占所有子公司总投资额的比重。国际化深度和广度的乘积即为跨国企业国际化程度。

3.2.2 解释变量

3.2.2.1 区域制度多样性

一国或地区的正式制度采用世界银行治理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中公布的6项核心指标(民众话语权、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

监管质量、法制水平、腐败控制能力)得分的简单平均来表示,得出总体制度质量综合得分。数值越大表示该国或该地区正式制度质量越好(李建军,孙慧,2016);一国或地区的非正式制度采用Hofstede文化评价指数来衡量。考虑到文化指标对跨国企业国际化决策影响的重要性,本文选取Hofstede文化评价指标中的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权利距离3个维度进行简单平均,从而量化各国或地区非正式制度质量(Noordehaven & Harzing, 2003)。

本文从区域视角出发,探究区域层面制度多样性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区域制度多样性分为区域正式制度(Ins)和区域非正式制度(Cul)。考虑到各国所在区域的国家数量不同,因此借鉴Biemann(2010)的测算方法,利用通过权重测算各国区域层面的制度多样性。具体公式如下:

$$\text{Ins}_c/\text{Cul}_c = W_c \times \frac{\sum_j^N = 1 \sqrt{(X_c - X_j)^2}}{N-1}$$

其中,N为区域内国家数量; W_c 表示区域内c国家GDP占区域内所有国家GDP总和的比重; X_c 为国家c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得分。

3.2.2.2 区域国家数量

参考世界银行对全球地理的划分,我们将样本中涉及的50个国家和地区分为9大区域。见附表1。

3.2.2.3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杨栋旭等,2015;曾德明,2016; Laura et al., 2017),本文选取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冗余资源(Sr),采用企业冗余资源取对数来表示;企业控股情况(So),以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股份比重来衡量;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国家人口(Peo),采用各国人口数量取对数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采用各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表示。国家层面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企业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3.3 模型设计

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具体模型如下:

$$\text{Int}_{itj} = \beta_0 + \beta_1 \text{Num}_j + \beta_2 \text{Insti}_{itj} + \beta_3 \text{Insti}_{itj}^2 + \beta_4 \text{gdp}_{it} + \beta_5 \text{so}_{it} + \beta_6 \text{sr}_{it} + \beta_7 \text{peo}_{it} + \varepsilon_t$$

$$\text{Int}_{itj} = \beta_0 + \beta_1 \text{Num}_j + \beta_2 \text{Cul}_{itj} + \beta_3 \text{Cul}_{itj}^2 + \beta_4 \text{gdp}_{it} + \beta_5 \text{so}_{it} + \beta_6 \text{sr}_{it} + \beta_7 \text{peo}_{it} + \varepsilon_t$$

式中: Int_{itj} 表示t年i公司在j国家所在的区域国际化程度; Num_j 表示j国家所在区域内国家数

量; $Insti_{ijt}$ 表示 t 年 j 国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 Cul_{ijt} 表示 t 年 j 国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 ε_i 为误差项;其余前文已经进行说明。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主要包括了观测

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控制变量中,我们对冗余资源和国家人口进行了对数处理,使得冗余资源均值为0.8,国家人口均值处理后为17.16,从而减小因数据处于不同区间所带来的模型共线性和异方差性等。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区域国际化程度	4,574	0.74	0.72	0.00	8.03
区域国家数量	4,574	6.49	4.00	2.00	16.00
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	4,574	3.04	1.03	0.31	5.34
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 ²	4,574	10.32	5.53	0.10	28.52
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	4,574	2.45	0.89	1.30	4.31
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 ²	4,574	6.81	5.06	1.69	18.60
gdp 平减指数	4,574	103.92	93.01	22.57	3,315.96
企业控股	4,574	0.92	0.16	0.15	1.00
冗余资源	4,574	0.80	0.38	0.22	6.76
国家人口	4,574	17.16	1.69	13.10	20.97

区域国际化程度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8.03,说明存在企业未在区域内进行国际化的情况,也有可能因为样本容量不够大,存在企业只是完成走出国门而并未进一步扩张的情况;区域国家数量最小值为2,最大值为16。符合附表1中对样本国家的区域划分。

4.2 回归分析

4.2.1 基准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本文采用了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①,回归结果见下表2。其中,模型1中只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区域内国家数量;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的平方项;模型5在模型4基础上加入区域内国家数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6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了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模型7在模型6基础上加入了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的平方项;模型8在模型7基础上加入区域国家数量进行回归分析。

由表2模型2看出,在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前提

下,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区域国家数量后,其系数为-0.0249,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内国家数量不利于企业区域内国际化,区域内国家数量越多,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提升,不利于企业的国际化从而支持假设3;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低到适度的区域制度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套利行为;这一阶段,企业的套利效益比制度多样性的风险损失要大。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的平方项,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的平方项系数为-0.0467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的系数为0.271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3和模型4由此证明了假设1,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与企业国际化呈现倒U型关系。低到适度的区域制度多样性对企业国际化有强大的吸引力,企业在该阶段能够克服制度多样性的挑战并通过区域内各国差异进行套利行为。然而,制度多样性过高对企业特定优势和企业的区域性聚集的不利影响会远远超过制度多样性带来的套利收益。模型5将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与区域国家数量共同加入进行回归分

① 通过 hausman 检验,最终在混合、固定、随机中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

析,结果都高度显著,从而部分证明了本文所探讨的区域制度多样性对企业区域国际化的影响。

模型6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回归结果不显著,而在模型7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和其平方项后,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的回归系数为0.220且在10%水平上显著,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0.0433且在5%水平上显著。

证明非正式制度多样性与企业国际化呈现倒U型关系。模型8显示主要的核心解释变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符合预期,从而证明假设2。

综上所述,从区域制度复杂性的组成部分对企业国际化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和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对企业的区域国际化呈现倒U型的影响。区域内国家数量的增加,跨国企业国际化所受到的不利影响也越大。

表2 随机面板效应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gdp 平减指数	-0.000214*	-0.000226*	-0.000188	-0.000171	-0.000162	-0.000205*	-0.000197	-0.000247**
	(-1.73)	(-1.87)	(-1.52)	(-1.39)	(-1.35)	(-1.66)	(-1.59)	(-2.04)
企业控股	0.204***	0.188***	0.194***	0.166**	0.139**	0.200***	0.209***	0.155**
	(2.97)	(2.77)	(2.81)	(2.42)	(2.05)	(2.91)	(3.03)	(2.28)
冗余资源	0.00247	0.00288	0.00112	-0.00369	-0.00424	0.00233	0.00437	-0.00225
	(0.09)	(0.11)	(0.04)	(-0.14)	(-0.16)	(0.09)	(0.16)	(-0.08)
国家人口	-0.0511***	-0.0617***	-0.0491***	-0.0401***	-0.0510***	-0.0561***	-0.0584***	-0.0645***
	(-6.35)	(-7.72)	(-6.07)	(-4.85)	(-6.26)	(-6.23)	(-6.44)	(-7.30)
区域国家数量		-0.0249***			-0.0282***			-0.0368***
		(-7.64)			(-8.46)			(-8.38)
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			0.0293**	0.271***	0.278***			
			(2.28)	(4.91)	(5.18)			
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 ²				-0.0467***	-0.0428***			
				(-4.50)	(-4.23)			
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						0.0211	0.220*	0.619***
						(1.22)	(1.93)	(4.14)
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 ²							-0.0433**	-0.109***
							(-2.14)	(-4.05)
常数项	1.402***	1.767***	1.287***	0.911***	1.247***	1.439***	1.764***	1.152***
	(8.75)	(10.78)	(7.67)	(4.88)	(6.69)	(8.84)	(7.92)	(5.02)
观测值	4574	4574	4574	4574	4574	4574	4574	457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 z 值。

4.2.2 分样本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实验结果,本文对数据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所有权性质和经营方式对跨国企业区域国际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3。

参考已有研究对中国企业所有权的划分,本文将企业分为国企和民营两种。模型1和模型2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均不显著,与本文假设相悖。模型3和模型4中,核心解释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与本文假设相同,完美验证本文的假设。对此,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母国对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提供资源和政策扶持且具有一定目的导向,从而帮助企业克服区域制度复杂性对其国际化的影响。而民营企业不具备资源和政策扶持的优势,因此区域制度复杂性对其国际化的影响较为显著。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子公司决策话语权主要取决于占股比例。本文参考 Huggins et al. (2007) 对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的划分方法,将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划分为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即若中国企业母公司对境外子公司企业股权占比在 10%~90%之间的视为合资企业;股权比例大于或等于 90%的视为独资企业。其中,样本数据中控股比例超过 90%的企业有 3 646 家,占总样本 79.7%。分样本回归分析,可以进一步验证区域制度复杂性对企业区域国际化的影响的稳健型(样本数据中已经剔除控股低于 10%的企业)。回归情况见下表 3。表 3 中,模型 5 和模型 6 对独资企业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核心变量区域内国家数量、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或非正式制度多样性进行回归;模

型7和模型8则是对合资企业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核心变量区域内国家数量、区域正式多样性或非正式制度多样性进行回归。模型5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核心解释变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区域国家数量每提升1个单位,跨国企业国际化程度降低3.3%;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对独资跨国企业国际化呈倒U型;模型6中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均高度显著,区域国家数量每提升1个单位,国际化程度降低4.36%;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呈倒U型;结合模型5与模型6,企业为独资情况下,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程度大于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笔者认为,呈现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企业国际化具有中心扩散的特点,在区域内国际化过程中优先选择国土接壤的邻国。由于地理的接壤,国家之间的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互借鉴,往往相差不大。差异主要体现在非正式制度上。由此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对国际化的影响大于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模型7和模型8对合资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主要核心变量不显著。对此我们给出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样本数据容量较少,本文中符合合资的样本容量占总体样本21.5%,导致实证分析结果不显著;解释二、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区域层面的制度复杂性主要对独资企业存在影响。合资方式的跨国企业往往选择与东道国企业进行合营,通过东道国企业的合作,吸收东道国人力资源来克服国际化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冲击,并在较短时间内适应东道国相应制度。

出于模型稳健性考虑,本文对各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指标进行平方项加总开平方根后进行测算区域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得分,然后带入回归分析验证。实证结果见表4,模型3、4、5检测了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区域内国家数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区域正式制度多样性的系数显著为正,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从而证明了假设1和假设3。模型6、7、8验证区域非正式制度多样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模型6、7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与假设相符,但不显著。在模型7的基础上加入区域内国家数量后,全部核心解释变量高度显著且结果符合假设2和假设3。由此,本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呈现区域性聚集特点出发,结合制度理论,探讨了区域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选取了2003-2013年中国700家企业共计2385家海外子公司的面板数据,探讨区域层面的制度复杂性与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选址的关系。研究表明:跨国企业在区域内国际化,可以利用区域内各国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区域聚集成规模效应和区域内各国间制度套利行为获利。同时,区域制度复杂性的组成成分影响跨国企业获利机制,从而影响跨国企业区域国际化。其中,区域层面的制度多样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呈倒U型,区域内国家数量负向影响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区域制度复杂性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还受企业所有制和经营模式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跨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址应考虑区域聚集带来的优势,优先考虑相邻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国别之间资源和制度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区域聚集和套利,从而提高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成功率。

第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均影响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往往更加普遍和明显。因此,国际化过程中,跨国企业需要格外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加强与东道国文化交流,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方式,进行本土化经营。

第三,跨国企业国际化决策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考虑经营模式。一方面,区域制度复杂性对不同所有制的跨国企业国际化影响不同。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决策往往出于某种特定需要,其国际化决策往往具有母国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区域制度复杂性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弱。而民营企业缺乏政策和资源扶持,因此其国际化决策受区域制度复杂性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区域制度复杂性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受经营模式(海外子公司股权占比)的影响,合资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作,能够提高跨国企业的适应能力,帮助克服外来者劣势。独资企业需要依靠自身特有优势,提升自身学习能力,才能更快融入到东道国进行正常生产经营。

附表: 区域分类

区域	国家和地区	区域	国家和地区	区域	国家和地区
东亚	中国台湾	欧洲	葡萄牙	南美洲	阿根廷
	中国香港		芬兰		智利
	日本		卢森堡		委内瑞拉
	韩国		挪威		巴拿马
泰国	西班牙		秘鲁		
东南亚	新加坡		奥地利	西亚	巴西
	马来西亚		瑞士		巴基斯坦
	菲律宾		荷兰		沙特阿拉伯
	越南		法国		以色列
东欧	乌克兰		意大利		北美
	俄罗斯	丹麦	约旦		
	白俄罗斯	瑞典	加拿大		
	土耳其	比利时	美国		
中欧	匈牙利	英国	大洋洲	墨西哥	
	捷克	德国		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	爱尔兰		新西兰	
	波兰				
	罗马尼亚				

图1 美国硅谷模式

参考文献

- [1] 杜江,宋跃刚. 制度距离、要素禀赋与我国 OFDI 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14(12):47-52.
- [2] 胡曙虹,杜德斌,范蓓蕾. 中国企业 R&D 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2019,38(7):1733-1748.
- [3] 李建军,孙慧. 全球价值链分工、制度质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16(4):40-49,共10页.
- [4] 李雪灵,魏骏巍,万妮娜. 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合法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跨国企业的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19,38(04):109-115.
- [5] 曾德明,苏亚,万炜. 国际化程度和企业绩效 M 型曲线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4):25-34.
- [6] 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研究,2012,47(5):71-82.
- [7] ALFARO, LAURA. Gain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cro and Micro Approaches World Bank's ABC-DE Conference[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16:w7.
- [8] ALI F A, FIESS N, MACDONALD R. Do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open economies REVIEW,2010,21(2):201-219.
- [9] ARREGLE J, BEAMISH P W, BERT L H. The regional dimension of MNEs' foreign subsidiary localiz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86-107.
- [10] ASMUSSEN C G. Local, Regional, or Global? Quantifying MNE Geographic Scop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3,40(7):1192-1205.
- [11] AULAKH P S, KOTABE M.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8,14(3):209-216.
- [12] BANALIEVA E R, DHANARAJ C. Home-region ori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3,44(2):89-116.
- [13] BANALIEVA E, DHANARAJ C. Home-region ori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3,44:89-116.
- [14] BARASA L, KNOBEN J, VERMEULEN P, et 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in East Africa: A firm level approach[J]. Research Policy,2017,46:280-291.
- [15] BATTISSE C. Dynamic Externalities and Local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Applied to Chinese Provinc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1,13:231-251.
- [16] BIEMANN T, KEARNEY E. Size Does Matter; How Varying Group Sizes in a Sample Affect the Most Common Measures of Group Diversity[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2010,13(3):582-599.
- [17] BOYD B. Corporate Linkages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 Test of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Model[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0,11(6):419-430.
- [18] BROUHERS, D. K.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Transaction Cost Influences on Entry Mode Choice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3,33(2):203-221.
- [19] BUCHANAN B G, LE Q V, RISHI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Some empirical evidenc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2,21(none):89.
- [20] BUCKLEY P J, GHAURI P N. Globalis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strateg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4,35(2):81-98.
- [21] DELIOS A, BEAMISH P W. OWNERSHIP STRATEGY OF JAPANESE FIRMS: TRANSACTIONAL, INSTITUTIONAL, AND EXPERIENCE INFLUEN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915-933.
- [22] DESS G G, BEARD D W.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Task Environmen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4,29(1):52-73.
- [23] DOWNEY H K, HELLRIEGEL D, SLOCUM J W.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The Construct and Its Applic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5,20(4).
- [24] ENRIGHT M J. Th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

- gional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 | The Roles of Regional Management Centers [J]. *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5, 45(1): 83-102.
- [25] FLORES R G, AGUILERA R V. Globalization and location choice: An analysis of US multinational firms in 1980 and 2000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7): 1187-1210.
- [26] FRANKEL J A, ROSE A K. 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 empirical treatment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6, 41(3-4): 351-366.
- [27] FURMAN J L, PORTER M E, STERN S. 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6): 899-933.
- [28] GHEMAWAT P. Semi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1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4(2): 138.
- [29] GULATI, RANJAY, SINGH, et al. The Architecture of Cooperation: Managing Coordination Costs and Appropriation Concerns in Strategic Alliance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8.
- [30] GULER I, GUILLÉN M F.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S venture capital firm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2): 185-205.
- [31] HITT M A, HOSKISSON R E, KIM H.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Product-Diversified Fir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40(4): 767-798.
- [32] HITT M, HARRISON J, IRELAND R D, et al. Attributes of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Acquisitions of US Firms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8, 9(2): 91-114.
- [33] HOLMES R M, MILLER T, HITT M A, et al.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Informal Institutions,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39(2): 531-566.
- [34] HUGGINS R, DEMIRBAG M, RATCHEVA V I. Global Knowledge and 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Recent Patterns in Asia Pacific,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7, 21(3): 437-451.
- [35] HUTZSCHENREUTER T, VOLL J C, VERBEKE A. The Impact of Added Cultural Distanc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Patterns: A Penrosean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2): 0-0.
- [36] 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6.
- [37] JENSEN N. Political Risk,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s*, 2008, 70(4): 1040-1052.
- [38] KEATS B W, HITT M A. A Causal Model of Linkages Among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Macro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31(3): 570-598.
- [39] KIM W C, BURGERS P H A W. Multinationals'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Risk-Return Trade-Off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4(4): 275-286.
- [40] KOGUT B, ZANDER U. Knowledge of the firm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4(6): 516-529.
- [41] KOSTOVA T Z S.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under conditions of complexity: The cas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1(24): 64-81.
- [42] KOSTOVA T, ROTH K.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 CRITIQUE AND NEW DIREC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4(33): 994-1006.
- [43] LI T J.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and Product Divers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national Fir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1): 179-196.
- [44] LIBECAP G D.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Book review) [J]. *Independent Review*, 2006 (September).
- [45] LU J W, BEAMISH P W.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S-CURVE HYPOTHESI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47): 598-609.
- [46] LUO Y, XUE Q, HAN B.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 Experi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1): 68-79.
- [47] MAKHIJA L M. Flexibility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It Valuable during an Economic Crisi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5): 537-555.
- [48] MEYER K E, MUDAMBI R, NARULA 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Local Context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ultiple Embeddednes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2): 235-252.
- [49] NOORDERHAVEN N G, HARZING A W. The "Country

- of - origin Effect "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ources, Mechanisms and Moderating Conditions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3.
- [50] NORTH D C.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1): 97-112.
- [51] OSTROM E.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3): 641-672.
- [52] PALMER T B, WISEMAN R M. Decoupling risk taking from income stream uncertainty: A holistic model of risk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20(11): 1037-1062.
- [53] PORTER M E.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80(2): 86-87.
- [54] RANGAN S. The Problem of Search and Deliberation in Economic Action: When Social Networks Really Matter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4): 813-828.
- [55] RUGMAN A M, BRAIN C. Regional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irms [J]. 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4, 44(3): 7-25.
- [56] RUGMAN A M, COLLINSON S. The Regional Nature of the World's Automotive Sector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22(5): 471-482.
- [57] RUGMAN A M, VERBEKE A. A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and Global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 [58] SANDERS W G, CARPENTER M A.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rm Governance: The Roles of CEO Compensation, Top Team Composition, and Board Structur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2): 158-178.
- [59] SCOTT W R. Institutional Theory: Contributing to a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 [J]. 2005.
- [60] 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J]. 199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Complexity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HEN Yikang¹, ZHONG Changbiao²

(1. Business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315211,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3152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gional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 Using panel data from a total of 2,385 subsidiaries in 50 countries, 700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3, we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lexity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includes the diversity of reg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s u-type,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on private enterprises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joint venture c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more quickly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peration. The furthe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should consider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ombined with their own actual situation, choose the appropriate mode of operation, with the help of regional aggregation and regional arbitrage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hina; reg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location selection